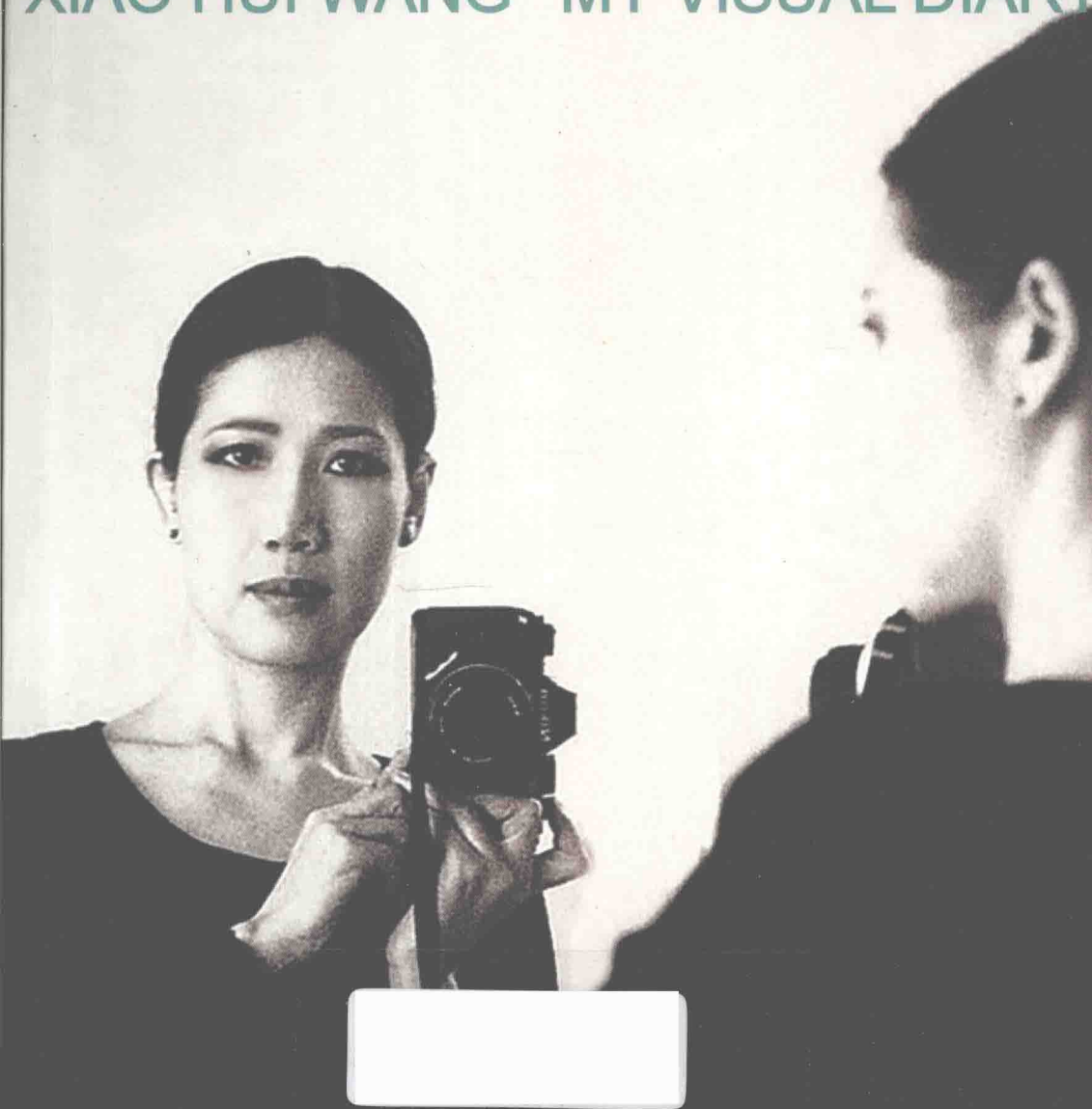


XIAO HUI WANG · MY VISUAL DIARY



王小慧 著

我的视觉日记

旅德生活十五年 · 出版十五周年纪念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WANG HUI WANG · MY VISUAL DIARY



王小慧 著

我的视觉日记

旅德生活十五年 · 出版十五周年纪念版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海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视觉日记/王小慧著. —郑州:海燕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350-6365-6

I. ①我… II. ①王… III. ①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3957号

出版人 黄天奇
责任编辑 李强 马晓璐
美术编辑 韩贵
责任校对 李培勇 齐笑
责任发行 贾伍民
责任印制 邢宏洲
装帧设计 熊翠

我的视觉日记

出版发行: 海燕出版社

(郑州市北林路16号 邮政编码450008)

发行热线: 0371-65734522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河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16开(700毫米×1000毫米)

印 张: 24.5印张

字 数: 380千字

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9.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谨以此书献给
生我养我育我爱我的父亲和母亲

序



贝歇尔自画像

亲爱的“小精灵”^①：

当我 1981 年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时，怎么可能想到现在会为你的新书写序言？我只能写封信给我的小慧，如果要给一本关于你生活的书写序的话，它本身就会是一本书了。

那年，我走进课堂时，眼前的座位上是一片蓝色，几百张好像是相同的脸孔在注视着我。对中国人来说我们这些欧洲大鼻子一开始看上去也都一样，甚至都穿牛仔裤，除了上衣是不同的。但我很快发现有三张脸孔与众不同，因为他们在笑。那时的上海还很少能见到这样的笑脸。一个穿着红白细条衬衫的女孩子，一张纯真的圆脸，两个男孩坐在她的左右——那就是你和俞霖、陈宇波。

我习惯于讲课后学生向我提问，并且共同探讨一些问题，但不同的习惯阻碍了我这个陌生的外籍教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所以只能通过我的夫人尼娜和你们悄悄地传递纸条来交换信息。否则，我们后来不可能在锦江饭店见面，我也不可能更多地了解你，不知道你、俞霖和宇波的想法和愿望。我们也有许多想要知道的事情，我们自己跑遍了全城并且发现了上海弄堂这种有魅力的住宅形式，它由老式中国院落演变成一

种中西结合的近代城市建筑形式，怎么会没人对这种建筑形式感兴趣？

那是“文革”后不久，对“四人帮”的诉讼尚未结束，但人们可以觉察到在地底下有什么在涌动，想从地下冲向光明。那时，我们就曾打算在德国共同搞一本关于上海里弄住宅的书^②。

五年之后，站在我达姆施塔特大学教研室里的是相亲相爱的一对：你和俞霖。你们终于来了。

几年后，你已经在慕尼黑建筑学院教书，俞霖在写他的博士论文。当你来参加尼娜的生日晚宴时随意地告诉我们，你内心已经与你的建筑师生涯告别了。我们大家都如坠云雾。那是1991年2月5日。谁知这竟是我们与俞霖的最后一面。

在中国，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承受苦难的能力，我们对此充满崇敬和惊叹。年长的一代人能承受人格的侮辱、精神的压抑以及失去一切的困境，他们唯一没有失去的是他们的尊严。现在的年轻人也有承受对他们命运打击的能力，这点被你证明了。你的孩提时代不是生活在铺满玫瑰的摇篮里，你早已尝过苦难的滋味，但你现在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并且自己去塑造它。我们的“小精灵”成了一个“大勇士”，但你仍然是你。

德国有句成语：“困境造就美德。”它里面有许多值得思索的含义，包括物质生活的日益舒通常常与精神文化的消退联系在一起。但怎样才能对几十年来生活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压抑中的人们说明这个道理？难道必须到人们十分富裕后才能明白其实并不需要那么多物质的东西？难道必须先把一些东西摧毁了才能找到自我？

那时，谁能想到你会这么迅速地成名？赞美你的作品其实并不是我的任务，你的作品已经在为自己说话了。不过，你的电影《破碎的月亮》对我来说是理解你作品的关键。你看过表现主义电影大师的作品吗？你知道法国导演让·谷克多（Jean Cocteau）的表现主义电影或是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了不起的作品吗？我在你的电影里也看到了同样的魅力。

从那时开始，对你来说便只有工作了。这是不是一种逃避？我想

不是。我更相信你在工作中找到了你的快乐。传教士 Salomon 变得明智后写道：“没有比一个人在工作中获得愉快更更好了，因为这是他的幸福。”老子是不是也说过同样意思的话。大思想家都是心心相通的。

你是个以世界为家、到处漫游的长途跋涉者，你常常问自己你的家乡在哪里，你在这个世界上到底属于哪里？19 世纪德国最重要的诗人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巴黎，他也常常为这个问题所困扰，他为自己创造了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家乡”，一个理想中的家乡。当我欣赏你的摄影作品或是阅读你的文字时，我知道你在到处寻找你的家乡，但你在哪儿也不会找到，除非在你自己那里。你就是自己的家乡，你只需要丰富她。

现在，你非常著名了，很多人会把你当作亚洲与欧洲之间的文化使者来看。有些人搞的所谓文化交流好像是把不同的酒调在一起，但每一种酒都把另一种酒变糟。我们真的想把本来已经很小的世界变得更小吗？我们真的想要那种到处都味道相同的“多元文化混合稀粥”吗？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架起桥梁是对的，为了和平目的相互沟通理解也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相互尊重。我们不应忘记对别人的创造表示赞赏，小慧，但也不能马上不加评判地陶醉其中，或表面化地模仿。文化要有独创性，而独创性不可能没有风险。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的国家，这个国家太久只靠传统来滋养，而且为皇权统治服务的儒家思想体系还有很牢固的根基。我肯定中国会产生一种新文化，这种新文化不是由西方文化来滋养，也不仅建立在传统文化之上。我很羡慕你能够参与创建这种新文化。德国已经在开始与自己的文化告别，可惜人们只有在失去它时才发现这一点。这是一种割断自己历史的衰退了的文化，除了消费以外毫无目标。在电视广告的间歇中，字幕上总是一句话：“我还想要更多！”他们把秩序和自由对立起来，并没有认识到它们之间本是统一体。自由中有秩序，秩序中也有其自由。你可以选择你想走的那条道路，它们相互并不排斥。我在你的摄影作品中发现了这两条原则的统一：对主题选择的自由和拍摄时的严谨与准确性。

没有人比你更加着魔似的去拍照，成百卷拍好的胶卷放在你的柜子里，但你从没有去看过它们，因为你根本没有时间。这使我回忆起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建筑师时，去造访当时著名的哲学家 Ernst Bloch，在他的房子里所有的墙壁直至天花板都摆满书，我不禁肃然起敬：“这些书您都念过吗？”“多么愚蠢的一个问题！”他以教训的口吻回答，“当然没有！”就像他占有几百万页思想杰作一样，你占有一个无数照片的世界。对你来说重要的是抓住有意义的瞬间。不过，小慧，你总会找到时间在你的照片世界里散一回步的。

谁会料到 you 从一个有才华的建筑师变成一个著名的摄影家？我没有想到，但这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你当然是一个建筑师！几乎没有一个学科像建筑学这样把那么多不同的、看上去毫不关联的东西结合在一起。通过绘画，我们学会观察；通过艺术史和建筑史，我们学会辨别；通过高等数学和力学，我们学会抽象思维；通过结构工程，我们学会支配材料；通过设计，我们学会综合和整体化能力。不过，学业只是学业，并非职业。你搞摄影、编导电影、组织展览、写作书籍、到处讲学……还有许多许多，这一切也都是在“建筑”。关键不在你学了什么，而在你建树了什么。

我的小精灵，我还有好多想写，但再写下去就得写一本书了，可这是你的书啊！你不要逃避你自己，你应该赏赐自己一些时间来生活，给予自己一些时间来赢得灵感，为了你的下一本新书，我已经为那本书感到高兴了。

你的老师马克思^③

注：①“小精灵”是贝歇尔教授根据“小慧”两个字的德文译意为我取的昵称。

②《上海里弄住宅研究》是俞霖在贝歇尔教授指导下的博士论文题目。同名的研究成果曾在德国出版于1990年，俞霖与我为合作者。

③马克思·贝歇尔（Max Becher）教授是德国著名建筑学家。曾多年担任德国德意志工艺联盟协会主席、建筑师协会主席、教育部教育改革委员会主席等，并出任许多国际重大建筑竞赛的评委主席。他除有许多著名建筑作品外，还是著名建筑批评家和社会评论家。经常在报刊发表文章，在世界各地讲学。他曾是俞霖的博士生导师。

目录

1	序
1	引子
3	我们可以飞了
19	路伸向何方
41	燃尽的蓝蜡烛
65	走过我自己
79	我的二十四小时
105	远处的光
133	重返布拉格
153	莎乐美舞
175	破碎的月亮
197	万里魂牵

217	我的孩子梦
241	推迟七年的书
263	关于死亡的联想
281	从眼睛到眼睛
307	理想主义傻瓜
323	抓住感觉
351	再生繁花

引子

已经是深夜三点钟了。我静静地躺在床上，没有开灯，天上也没有月亮。夜沉寂得能让人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声。清冷的街灯透过方格形的磨砂玻璃窗射进屋来，在墙上显出清晰的格子图案。偶尔驶过的汽车强光使图案轻轻移动，有时漫射到天花板上，令人感到迷离而怅惘……

几天来因病不得不躺在床上，翻看了出国以来的几十本日记，重温这些年所经历过的复杂而曲折的心路历程，回忆就像这映在墙上和天花板上的斑驳光影，时而明晰，时而模糊，混杂交错，重重叠叠。许多往事还是那么铭心刻骨，时至今日仍有切肤之痛，很难设想我还能再经受第二遍。

重读这些日记，又重读了一个最最真实的我。写下这一切原本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记录自己的生命，记下那些值得回忆的东西。被我称为“视觉日记”的那些照片，与文字一起更加形象和完整地记录了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悟。

我有意识地拍摄“视觉日记”是从1991年为准备摄影展《我的二十四小时》开始的。在那之前我也拍，但拍得过于随意，毫无目的。从那以后，拍摄生活中点点滴滴能触动我某一根敏感神经的或大或小的景与物，好像已成为一种习惯，成为日常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没有这些照片我无法想象能记清那么多发生过的事情，乃至很多细节。它们使记忆不再流失，就像一盘散乱的珠子被一根丝线串到一起。

毕加索曾经说过：“我作画就像有些人写自传。画，无论完成与否，都是我日记的一页，也只有在这意义下，它们才有价值。”我想，我的“视觉日记”也有这种特质，它们只有在连贯的整体观照之中才有意义。

它们既是我的感情日记，也是我的思想日记；通过文字我可以更细致地梳理思路，而通过照相机则能更用心地看世界并体验人生。有了它们，我的生命线索就会延续。它们记下的也许只是对我个人有意义的东西，它们已与我无法分离。

假如上帝只允许我带走两样东西的话，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这两样东西是日记本和照相机。”

我们可以飞了



At least We're Flying

29/9/1986. It was a very unusual wedding.

It happened just one day before our plane was due to leave China for Germany, without any guests or celebration. The wedding had to be kept secret because, in 1986, there was a rule that married couples were not allowed to go abroad together.

Lin, the man who became my husband, and I both worked as assistant lecturers in architecture at Tongji University in Shanghai, and we had known each other for eight years.

We had been selected by our university to study in Germany on an architecture scholarship. Such opportunities were rare in China at that time, and we had been waiting many years for a chance to study abroad. During those years we became friends with Professor Bächer and his wife, who had been giving lectures at our university. They offered us all their support, inviting us to Germany to continue our studies. When I think of Professor Bächer, I always remember something someone said about him "His face shows more humour than wrinkles". We did not accept his kind offer as we did not want to trouble him, even though it would have been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us then.

As we were about to board the plane, our trip to Germany was suddenly cancelled. A phone call a few hours before our flight requested us to stay in China. An anonymous letter was the cause of all the trouble. Certain officials claimed that we had taken bribes during our last architectural project. This put us in a very awkward position. We were totally isolated and everyone was encouraged not to talk to us. A month later we were finally allowed to leave for Germany, once they had found out that all the accusations against us were unjustified. However a new problem arose: our status as a married couple meant we were not allowed to go abroad together. This was the very reason why we had married so quietly one day before our original departure date. Eventually, the whole problem was sorted out thanks to the miraculous support of the professors at Tongji University. Their help paved the way, and eventually we were granted exceptional leave to go together.

When we were finally on the plane, I thought we were just like that plane: it had to build up speed and use all its power to overcome the friction on the runway, just as we had needed all our strength to overcome our troubles. However, once the plane took off, it flew along smoothly, and I could never have guessed that our real troubles had only just begun...

As soon as we arrived in Germany we were separated, as my husband was going to study in Braunschweig while I would be in Munich. I had a wonderful autumn in the city, revelling in natural colours that were quite new to me. Even now, autumn remains my favourite time of the year - the "Golden Season".

Eventually, the Christmas holidays brought Lin and I together in the apartment that Professor Wehberg had provided so we could enjoy our postponed honeymoon. It was the most beautiful time for both of us, and it compensated for many frustrating memories of our problems in coming to Germany.

题图：1986年的夏天，在上海家里晒台上。那时日子总是这样阳光灿烂。

飞机在跑道上加速时，地面的摩擦力非常大，要有足够的能量来克服这些阻力。一旦离开地面，空气的阻力与这摩擦力相比微不足道，飞机就可以自由飞翔了。最难的是在起飞之前那一段。

1986年10月30日

没有鲜花，没有婚纱，没有戒指，没有仪式，没有宾客和喜宴，也没有朋友的祝愿，因为并没有人知道，也不能让人知道。只有一张印刷粗糙而俗气的结婚证书，大红的底色上印着金色的双喜，里面有我和俞霖的照片。那是两张年轻而稚气的脸，看上去像兄妹，笑得甜美。这是我对一生中唯一“大喜日子”的所有记忆，其他便是那似乎永远整理不完的行装，因为要带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那是1986年的9月29日，去德国留学的前夜。

在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的机会极少，尤其是取得公费奖学金，更是难上加难。在上海同济大学读二年级的时候，我们建筑学系的两个班级，各抽出一名学生去进修德语，准备一年后选拔出一名学生派往维也纳艺术学院学习。当时我和另外一个班的名叫俞霖的学生被选出，这样我和他便偶然地碰到一起。

俞霖是被当时的系主任，中国建筑界元老冯纪忠先生称为“不可



当年的研究生是很稀罕的，女研究生更是寥寥无几。记得“七七级”考研整个建筑学专业好像只有两个名额。戴着同济大学红色校徽在外面走，常会招人多看上几眼。大概这小小的虚荣使我显得如照片上那样志得意满。

多遇的”“有特殊才能”的学生，后来的院长戴复东院士也说过“像他这样的人才，七八年才可能会出一个”。他的设计作业和画作总是挂在系走廊的陈列橱窗里当作范例供人参观，自然他的名字在同学中也颇有几分名气。我印象中的他个子瘦瘦高高的，有一张孩子气的脸，总是笑眯眯的，举手投足之间不时透出一股灵

气，好像话并不多。

遇到学习中有难题的时候，许多同学愿意去找他，据说他和善谦虚、乐于助人。有些设计图经他一改分数就会高出许多。我没有去找过他，但每次去他的教室，总会看到有同学站在他桌旁请他帮忙，我感到他一点也不像有些高材生那样自私和保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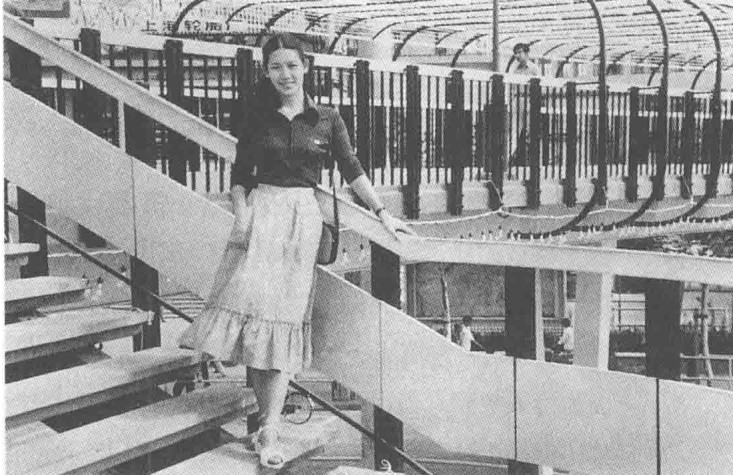
当我得知被选派专职学德语时，一高兴把全部课本都送给了同学，一心只想学好德语去留学。而他仍然坐在他教室里的老位子上继续做“老班级”的功课。这让我有些惭愧而且后悔，因为我太轻率而没考虑到万一有什么意外不能出国的话，我会处于一种很尴尬的地位。

直到开始去学习德语时，我们才正式认识。学习了几个月后，不知何故，那个留学名额分给了外语系的学生。

由于我们是“文化大革命”后第一次恢复高考的“七七级”学生，和后面的“七八级”相差只有半年，而德语学习整整耽误了一年时间，我们很想抓紧补习以便跟上“七八级”课程以及研究生考试，因此像散兵游勇，同时在两个年级听课、补习，进进出出几乎形影不离。

那时比较熟悉的老班级同学喜欢和我们开些善意的玩笑，说我们

在俞霖 1984 年设计并获奖的上海徐家汇人行桥上



是一对“金童玉女”，我们自己却傻傻乎乎的，一心一意只去学习、考试，没想其他。那年没有去成维也纳，反而成全了我和俞霖的缘分。我们在一起学习那么愉快，那么开心。因为太忙，没有很多时间和闲情逸致“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更像两个无忧无虑的孩子。

为了补上这半年缺少的课程，我不得不忍痛放弃许多业余爱好，像看电影、读小说、缝衣服，以及刚刚开始允许跳的交谊舞。只有假期的旅行和学生摄影协会的活动，我不愿放弃，因为我太喜欢摄影了，几乎到了着迷的地步。那时会在假期拍许多照片，然后整夜在暗房里冲印、放大照片。那时没有专业书籍和指导教师，浪费了许多胶卷和相纸。不过假如没有这些浪费，也许不会有今天。

在那几年中，我们有过三次机会去德国留学，其中有两次是俞霖到德国后博士第一导师贝歇尔（Max Becher）和第二导师史密特（Peter Schmidt Thomson）邀请的，当时他们在同济大学做客座教授，作几个月的短期讲学，我俩不光听课，也担任翻译及陪同，所以与他们交了朋友。贝歇尔教授当时问过我名字中文的意思，

到上海读书远离天津的家，也远离了心爱的钢琴。这架新钢琴是父亲送的结婚礼物，可惜它无法伴我左右，随我远渡重洋。

